

中国财经外交的又一里程碑

——写在第八届 APEC 财长会成功召开之际

○ 本刊评论员

2001年9月8日至9日,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会在中国苏州召开。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主办 APEC 财长会议。来自 APEC21 个成员经济体的财长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们聚集一堂,就当前全球与亚太地区宏观经济形势、国际金融框架改革、结构调整与全球化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而卓有成效的讨论。会议通过了《财长会联合声明》《国际金融框架改革进展报告》以及《财长会向领导人会报要点》等重要报告,为将于10月份在上海召开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和决策参考,从而为领导人会议的成功召开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舆论认为,本届财长会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评估比较全面客观,既清醒地认识到了当前经济发展的困难和风险,又表达了解决问题、推进改革的决心,财长们加强合作、共同克服困难的意愿将有助于鼓舞投资信心,为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回升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政府藉主办第八届 APEC 财长会之机,通过传统与现代韵味相结合的古城苏州,向外界展示了中国古老灿烂文明与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会代表对此印象深刻,对中国政府对财长会的重视与有效率的组织工作给予积极的评价,可以说财长会的成功是中国财经外交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

应当看到,新世纪之初是新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确立的关键时期。在这样一个整合和调整时期,一国如采取消极的态度,或独善其身,置身于制定国际政策之外,就将失去参与全球经济发展与全球游戏规则制定的机会,只能越发地被孤立,落伍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最终损害的也将是自己的利益。同时,过去20年的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经验教训说明,那种完全依靠自由市场方式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方式正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突出表现为收益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无法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这些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全球化的焦虑和反对浪潮。这说明,在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竞争与合作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各国之间更需要通过加强合作和经济政策的协调,才能更好地分享全球化为人类文明带来的益处。这些都给中国的整体经济外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的机遇与挑战,要求我们主动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结合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游戏规则制定,最大限度地为我国经济发展谋求有利的国际环境。在整体经济外交方向下,财政金融领域的对外交往与合作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财经外交中的作用日渐突出,已成为国际经济中举足轻重的成员之一。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危机的巨大压力,成功地保持了人民币不贬值,同时积极参与对有关国家的援助,在促进亚洲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中国的财经外交由此崭露头角。之后,根据国家的整体外交和经济战略,财政部代表国家在多个国际组织和包括 APEC 在内的财经论坛积极开展财经外交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首先,中国在多边财经论坛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除了 APEC 财长会,还在 20 国集团(G—20)、亚欧财长会议、马尼拉框架财政及央行副手会、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央行行长会议(EMEAP)等其它多边财经论坛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其中 G—20 的作用尤为突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该组织成立起,就在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等重大问题的讨论中,积极发表中国 and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观点,推动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其次,中国还积极参与并推动了东亚地区的区域金融合作。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亚洲各国痛定思痛,区域金融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积极倡导并推动了建立在“东盟+中日韩”(“10+3”)框架下的财经合作。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10+3”财长们通过了东亚财经合作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清迈倡议”。该倡议将原来东盟之间的货币互换安排扩大到所有成员,并与中、日、韩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和债券回购安排,其目的是补充现有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中心的国际多边资金援助机制,为“10+3”国家在面临国际收支困难和外汇支付危机时提供短期外汇流动性支持,从而加强东亚国家整体应付金融危机的能力。“清迈倡议”是“10+3”框架下加强东亚资金自助和支持机制的良好开端,它标志着东亚国家在区域金融合作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下转第8页)

(4) 过去高增长后面隐藏着严重的结构问题。

(5) 一些发达经济体进口需求的下降,影响了亚洲地区的出口,美元升值又使亚洲地区出口竞争力进一步下降。

(6) 信息透明度不够,市场反应失灵,容易造成波及影响。

(7) 对冲基金的投机行为加剧了市场上连带及波及效应。

会议通过的《联合声明》强调,为了促进地区经济的复苏及恢复稳定,应加强区域金融监测,落实各国国际金融机构为应付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增加 IMF 短期储备金、提高贷款限额、确认新借款安排及其他多边、双边资金安排。对有关受金融危机打击的经济体正在有效地执行 IMF 支持的经济改革方案和一些经济体成功地重返国际资本市场表示赞赏。

▲ 1999 年 5 月 15—16 日,第六届 APEC 财长会议在马来西亚兰卡威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区域经济和金融形势、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和财长会议框架下各项联合行动倡议的进展情况。一些经济体认为:

(1) 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经济体经济已走出危机谷底,复苏的速度比预料的要快。金融危机使一些经济体贫困人口增加很快,因此要加强扶贫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2) 国际金融框架改革涉及全球各方的根本利益,应有充分的机会让新兴市场经济体参与框架设计进程。

(3) 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尤其是高杠杆率金融机构资金无序流动的监控;加强对私人部门信息披露的监管,加强对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在全球范围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加强债务风险的管理,实施灵活的汇率制度。

会议通过的《联合声明》指出,亚洲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之后,一些经济体面临着结构调整的严重挑战。如何加强各经济体的经济基础,防范危机的再度发生,以及恢复国际投资者的信心,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并保持经济健康发展,成为亚太地区各经济体政府的首要任务。各经济体应加强自身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管理,鼓励企业加强自律;加强社会安全网络的建设,减轻危机对社会贫困阶层的影响。在重建国际金融体制问题上,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和合作,国际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发挥主要作用。鼓励各经济体增强信息透明度,遵守信息披露标准。同时强调私营部门应该参与到危机的防范和解决过程中来。

▲ 2000 年 9 月 9—10 日,第七届 APEC 财长会议在文莱斯里巴加湾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区域经济和金融形势,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健全和完善金融市场以及增强 APEC 财长会议作用等议题。会议认为:

(1) 随着本地区经济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加速复苏,充分利用技术革命和经济一体化的益处,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其风险的挑战更加突出。利用好全球化带来的机会,是实现 APEC

成员稳定、安全和繁荣这一共同目标的基础。

(2) 继续实施有效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推进结构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同时重申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对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

(3) 促进更加自由、稳定的资本流动。继续推进政策改革,以便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带来的机遇。应在 APEC 内部建立加强金融市场的政策对话,探讨执行国际标准和准则的有关问题。

会议的主要成果有:

(1) 会议是在 2000 年全球经济高速增长时召开的,探讨了如何深入结构改革和调整,巩固经济增长等问题,对促进本地区可持续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 从本届会议开始,财长会提前到于领导人会议之前召开,财长会的讨论成果将提交领导人会议,其职能从落实领导人会议的指示精神转为为领导人会议提出政策建议,提高了财长会议在 APEC 进程中的作用。

(3) 会议就加强经济和公司治理、打击金融犯罪、改善社会安全网络、运用信息技术创造新机会等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建议从 2001 年初开展加强本地区公司治理的政策对话;建立一个工作组就各经济体内打击金融犯罪的立法与监管体系进行调查;建立设计优良、灵活、有针对性及节约成本的社会安全网络,照顾社会贫弱人群的需要;制定并实施恰当的政策,促进电子金融交易。

(上接第 1 页)

再次,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也正在发生转变。与世行的合作关系由过去的以利用贷款资金为主逐步转向发挥我国作为世行重要借款国和股东国的双重作用,争取和维护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中国力

争更大地发挥股东国的影响。

此外,中美、中英、中德等机制化的双边财经对话也日益增多,讨论的内容也日趋广泛和深入。

展望新世纪,中国财经外交工作任务重道远。继 APEC 财长会、贸易部长会等专业部长会后,中国还将在今年 10 月承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02 年,中国将在上海承办亚

洲开发银行第 35 届年会,在北京承办全球环境基金第二次成员国大会。这是对外展示我国改革开放成果、发挥我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的重要机遇。我们相信,只要坚持既定的方针和原则,在 APEC 财长会之后,中国财经外交工作会取得更加积极的成果与更加重大的突破。